

# 论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一般特性及意义

张昌平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已经形成了以容器和兵器为主体的特性,容器中又形成了食器和酒器相结合的礼器性质,并有了较为稳定的器物组合形式。在制作上,三分外范成为基础的合范技术形式,装饰成为礼器的重要表现方式,并深受制作技术的影响。兽面纹等想象动物纹样作为主要的装饰内容,初现古代中国抽象艺术的风格。因此,二里冈文化青铜器已经大体具备了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基本特性,并开始塑造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仪特性。

**关键词:**二里冈文化;青铜器;制作;礼器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识别号:A

文章编号:1001-0327(2024)03-008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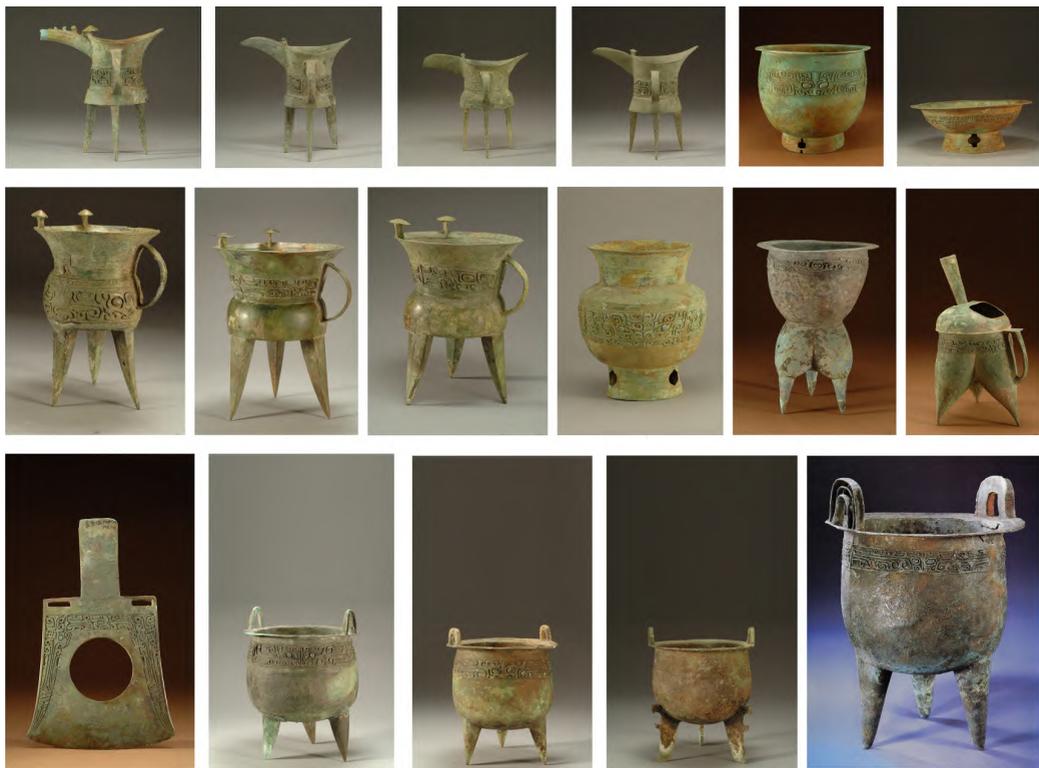
虽然从青铜器的发展角度,二里冈文化早晚两个不同时期应该分别处于青铜时代不同的发展阶段<sup>①</sup>。也就是说从青铜器特征来看,二里冈文化早期与二里冈文化晚期之间差异性更大,前者更加接近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后者更加接近殷墟文化早期青铜器。不过,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青铜器仍然具有较多的整体性特征。相较于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一阶段青铜器在制作、装饰以及生产规模上都有了很大发展,折射出当时经济生产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二里冈文化青铜器还处于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发展高峰的前序阶段,是后者繁盛的基础。从更长时段的历时性来说,二里冈文化青铜器的发展还体现出多方面的社会创新及其所产生的深远文化影响。因此对这一时期青铜器的一般性特征和意义进行探讨,具有超乎时代的意义。过去学者已有很好的研究成果<sup>②</sup>,本文将结合这些成果,作进一步的讨论。

## 一、器类与器物群

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的器类,容器包括鼎、方鼎、鬲、甗、簋、觚、爵、斝、尊、罍、壶、盃、盘,兵器有戈、矛、钺、刀、镞等,容器的类别较之此前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只有鼎、爵、斝、盃少数几种器类,显然丰富了许多。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容器无论在类别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超兵器和工具而占据绝对优势,奠定了青铜容器作为主要礼器的社会地位。盘龙城李家嘴M2单座墓葬出土的器类包括鼎、鬲、甗、簋、觚、爵、斝、尊、盃等19件容器(图一),以及钺、戈、矛、镞、刀、铍、凿、镞等较多的兵器和工具,代表了当时高等级贵族所享用的器物群。从发展阶段来说,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大体有如下一些特性。

形成容器和兵器作为青铜器主体的特性。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器类包括鼎、方鼎、鬲、簋、觚、爵、斝、尊等常见的容器,戈、矛、钺等兵器,铍、刀等工具。容器、兵器、工具这样的类别是承袭自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之后,工具逐渐少见,容器和兵器成为青铜器的绝对主流,并成为使用者社会地位的标

作者: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图一 李家嘴M2出土青铜器

志。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爵等青铜容器已经明确具有礼器的性质。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容器无论是数量、体量都成为最重要的器物类别。盘龙城李家嘴M2、杨家湾M11等高等级墓葬中，容器和兵器不仅占据绝对主要的地位，也都充分体现了器主的身份。可以说，二里冈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以容器和兵器为主要内容的特性，已经形成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社会价值取向。

器物类别的构成初具礼器的系统性。二里冈文化时期容器中包括炊食器和酒器，前者既有鼎、甗、鬲等炊器，也包括簋这样的盛器。酒器中既有觚、爵、斝等饮酒、温酒器，又有壶、罍、尊、盃等大型盛酒器。虽然盘作为水器的性质尚不明确，但食器和酒器所包含的器类，基本代表了整个青铜时代礼器的构成。兵器中勾兵的戈、刺兵的矛、远程射兵的箭（鏃），是在兵器中最为常见的。作为仪仗性兵器的钺，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这样的兵器配

置，几乎在青铜时代早晚不同时期也都是常见的。不同器类可见的变化，则主要是其在形态上的演进。因此可以说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器类，基本上代表了青铜时代青铜器器类的构成。

容器的使用出现组合的特性，礼制初现端倪。如果以西周中晚期出现的列鼎作为成熟礼器制度的话，此前的制度化实际上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很长的过程。二里头文化时期，贵族墓葬中青铜礼器几乎只随葬单件的爵，并需配置不同材质器如漆质的觚、陶质的盃作为搭配，成套青铜礼器在当时还没有形成。二里冈文化早期，西吴壁多个墓葬出现成套礼器，如M16为鼎、斝、爵，M8为斝、爵。在盘龙城杨家湾M6，青铜礼制组合为鬲、爵、斝。当时常见组合有鼎或鬲的食器，再加上爵、斝等酒器形成初步的组合。从单器到组合，体现了青铜器作为礼器在器用上的系统性表达。二里冈文化晚期及其后，组合开始

变得多样化和等级化。常见的组合除了鼎等食器和觚、爵、斝等酒器之外,不少级别较高的贵族墓如上述李家嘴M2,随葬品既有不同类别的食器,也有不同类别的酒器。二里冈文化青铜礼器的大类组合是以食器搭配酒器,同时在器类数量上又以酒器为多,这也成为商时期青铜礼器的构成特点。

青铜礼器定位社会阶层的功能开始形成。二里冈文化晚期,鼎体量的大小、觚爵斝套数的多寡,成为进一步区分不同贵族等级高低的标志。如在盘龙城,一般贵族墓葬中青铜礼器的组合是一件食器鼎或鬲,再加上一套酒器即觚、爵、斝各一;而在高等级墓葬如李家嘴M1、李家嘴M2、杨家湾M11等,都是有多件食器,其中包括体量较大的鼎,同时有多套觚、爵、斝,再加上尊或壘等大型酒器。我们知道,西周中晚期开始成熟的青铜礼制,就是以相同组合礼器的不同数差,来定位不同贵族的级别,如7鼎6簋、5鼎4簋等。以此为基本原则的礼制,又为其后历代王朝所承袭,并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因此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的器用,实际上已经成为其后礼制运作方式之滥觞。

青铜器作为礼器的核心地位确立。以饮食器皿和装饰物为基本形式的礼器,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传承已久。仰韶时代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许多考古学文化的实用性陶器开始分化出具备礼仪性的器皿,甚至还出现了相同器形的列器。龙山时代除了陶质礼器,玉礼器在良渚等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追求贵重材质成为礼器的一个发展趋向。二里头文化礼器以青铜器为新兴材质,并整合包括绿松石在内的玉器,或者还与一些精制的陶器结合,形成多材质礼器的格局。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礼器迅速发展,在单器体量、器物数量、技术水平、生产质量等多方面超乎其他材质礼器,并成为礼器中绝对的核心。这一核心地位,一直贯穿于青铜时代并延续至其后。

当然,二里冈文化青铜器仍有较多的原始之处。青铜容器的制作仍然有较大的随意

性,器形的规整和规范程度较低。器类和造型基本都脱胎于陶器或者漆木器。这一时期尚未形成青铜器器类和器形独立发展的生产水准和社会机制。

## 二、制作技术

以容器为主要生产对象、以多块外范与芯范组合形成的块范法铸造技术,是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基本技术特征。二里冈文化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已基本成熟,同类青铜器的形态、装饰与技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同器形器物系统地使用不同技术方式来处理,这些也都是整个青铜时代青铜器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在具体的制作技术环节,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也有如下几个方面,代表青铜器技术发展的方向和成就。

三分外范为基础的合范技术系统形成。二里头文化末期,块范法成形技术形成,并成为中国青铜生产技术的特色<sup>①</sup>。二里头文化爵、斝、鼎等容器的外范有二分、三分等不同,范型技术尚不稳定。对于圆体且有装饰脱范需求的容器而言,三分外范是最佳的分型方式。这一方式还可以与圆体三足器完美结合,将分型面设置在三足中央。二里冈文化中鼎、鬲、甗、斝、盃等三足器,簋、壘、尊、壶等圆体圈足器,均采用三分外范,正是上述方式的体现。殷墟文化时期圆体容器采取复杂的六分方式,也是基于这种三分外范的体系。此后,三分外范作为绝对主流的分范方式,贯穿于青铜时代的圆体容器,成为一项有统治力的技术系统。

二分外范作为范型的补充方式,形成了合范技术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中并非所有容器都单一地三分外范,爵和觚采取的是二分外范的合范方式。前者是因其扁体的器身,后者是因其细长的形制。这样不同的技术选择,在范型发展上避免了程式化的技术线路。殷墟文化时期除了爵、觚采取基于二分的四分范,双耳的簋、壘(上部)等也采用四分外范的做法。青铜时代晚期



图二 李家嘴M1出土青铜器

分铸技术盛行,简单的铸件如足、耳,多采取二分外范。基于不同器物形态,做出不同的技术选择,块范法技术系统得到了合理的发展。

纹饰布局和合范方式协调一致,纹饰制作成为技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纹饰与技术互动中发展。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装饰十分普遍,装饰与铸造技术完全协调。这主要表现于纹样在布局上与合范方式完全一致,纹样单元的划分依照分范方式而行,单元分界重合于分范范缝。即当器物三分范时,纹饰为三组;当器物二分范时,纹饰为两组。这样的一致性是基于纹饰制作从属于合范技术,并成为器物制作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方式和原则,贯穿于西周中晚期之前的青铜时代早期,成为装饰与技术互动的典型。

辅助成形的铸接技术开始使用。块范法的成形技术在处理复杂器形时会遇到困难,铸接技术则是对此提供很好的支持。在盘龙城青铜器中,李家嘴M1:5簋的双耳是后铸铸接的,这样一体化的连接方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铸接技术。当然,李家嘴M1:9壶的提梁通

过环耳与器身联接、通过提链与器盖联接,则是另一种串联技术。青铜时代早期,一次成形的浑铸在整体性上效果较佳,也是当时技术的选择方向。铸接所处理的对象往往是在当时技术条件下难以完成的,在殷墟文化时期,少数形态复杂的器耳也是铸接为一体的。对比年代稍早的李家嘴M2和稍晚的李家嘴M1青铜器可知(图二),即便在较短的时期内,二者在辅助技术上的演进也是显而易见的,如铸接技术均出自李家嘴M1,分别是M1:12罍、M1:13罍、M1:9壶和M1:5簋。此后连接技术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先铸、后铸、焊接等多种连接技术方式,并成为块范法铸造成形技术系统下重要的补铸手段。

支撑块范法铸造的芯撑技术形成。块范法铸造容器的一项关键技术,是在外范和芯范之间形成均匀的空腔,浇铸后铜液在空腔中充型,形成青铜器器壁,芯撑就是这项关键技术。二里冈文化青铜器已较普遍地使用金属芯撑——垫片<sup>[4]</sup>,垫片也由此成为块范法技术系统下独特而又普遍的方式。垫片的使用

至青铜时代之后仍延绵不绝，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生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里冈文化青铜器也有较多制作技术局限。如盲芯技术尚未形成，使鼎、鬲等较粗的器足不得不使用空足；足、耳等附件追逐于分型面，形成很特别的一耳对一足的四点配列式。如此等等，都是技术不足以支撑形制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直至殷墟文化时期，这些技术短板才得以弥补。

### 三、装饰艺术

与二里头文化青铜器鲜有装饰的情况不同，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装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青铜器器表处理得光洁平整，容器上几乎都施加纹饰，兵器上也常见纹饰，装饰成为普遍性现象。这一时期装饰的内容既有兽面纹、夔纹、兽首等动物形纹样，也有云雷纹、弦纹、涡纹等几何形纹样。装饰设计上不仅有单周纹饰，同时也向多周纹饰发展。同时，单周纹饰横向展开，将纹饰单元分割成等分而规整的幅面；多周纹饰纵向排列，以适应于不同径值的容器。这样单周与多周的形式，形成完整的布局效果，是中国青铜时代容器装饰的共同特征。因此，装饰由此开始成为青铜器作为礼器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并开创了多方面的特性。

想象动物纹样为主体的装饰内容，代表了青铜时代青铜器的装饰倾向。二里头文化时期，除了绿松石牌饰之外，青铜礼器几乎没有施加装饰。二里冈文化青铜容器装饰发展迅速，兽面纹迅速成为最重要的纹样，并普遍地装饰在器物中重要、主体的部位。二里冈文化之后，兽面纹以及类似兽面纹构图方式的鸟纹继续流行于商周之际前后，再其后龙纹及其变体蟠螭纹、蟠虺纹流行于西周晚期之后直至战国时期。从兽面纹、鸟纹再到龙纹、蟠螭纹，这些都是想象而非现实的动物纹样，因此想象动物纹样从二里冈文化时期开始，成为整个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装饰的重要内容。

装饰开启了抽象、写意的古代中国艺术风格。兽面纹不是对某种现实动物的写实性描绘，而只是对一般哺乳类动物正面的抽象表达。殷墟文化时期兽面纹开始有眉、角、牙乃至颚、爪等具体的器官，甚至会表达虎、牛等现实动物的局部，但兽面纹基本上仍然是非写实的、虚幻的。这样抽象而非写实的艺术风格直接影响着其后的艺术风格。西周时期流行的鸟纹同样也只是对鸟侧身的勾绘，东周时期的龙纹更是虚幻且抽象的。自此，抽象的艺术表达成为其后中国绘画等艺术风格的突出特点。

左右对称的构图引领装饰艺术理念乃至社会观念。二里冈文化时期兽面纹在构图上的主要特征，是以中央的鼻梁为中轴，左右对称展开。这样的形式在殷墟文化时期及其后的兽面纹中仍然沿用，并影响到其他类别的装饰。如单向的夔纹、龙纹、鸟纹经常以两两相对的方式对称排列，甚至两周之际前后的纹饰如窃曲纹、重环纹等仍会左右对称排列。虽然对称性是自然界特别是人类体质的重要特征，但对称性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装饰等方面的观念中的表现并不突出。因此有理由认为兽面纹这样在礼器中占绝对优势的装饰，影响到建筑等生产活动、礼仪等社会活动中的观念。

纹饰横向带状展开、纵向多周重叠的布局特征。容器特别是深腹的盛器在不同的高度有变化较大的径值。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以绘制的方式易于处理这样不规则的画幅，但其不规整的表现方式会使仪式感有所欠缺。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窄带的纹饰横向展开，并沿顺不同的外范划分成为两个或三个单元。这样不同的纹饰单元等分而规整，合乎青铜器作为礼器的装饰需求。当装饰进一步发展而采取的多周纹带，在增大装饰幅面的同时又解决了不同体径的问题，装饰有了丰富性和层次感，并使未来装饰的多样性成为可能。因此当殷墟文化时期主次不同、多周纹带满满地装饰整个青铜器时，二里冈文化时

期装饰布局的意义更加显现了出来。

如果说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代表了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初始,那二里冈文化青铜器基本上定义了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基本特征,并形成了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基本面貌以及发展方向。从这个维度上说,二里冈文化青铜器在古代中国物质文化发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二里冈文化青铜器的发展还处于尚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不少技术障碍有待解决,装饰艺术较为平淡、简单,作为礼器最具表达力的铭文还未出现,器物群的仪式性未能达到殷墟文化青铜器的肃穆和豪华感。古代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处于重大突破、迎来高潮期的前夜。

另一方面,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的技术特性,是基于青铜容器用作礼器的社会性质。因此青铜器的发展,是在生产中完善器形、装饰等方面的设计,或者说是为适应社会需求而发展。这样器形、装饰与技术的互动以满足社会需求,又是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发展的总方向。对于二里冈文化时期而言,青铜器开始摆脱陶器造型和功能的影响,逐渐形成以青铜器为特质的礼器系统,青铜器开始

成为最重要的礼器,界定和区别阶层,强化等级理念,维系社会秩序。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开始塑造这样的礼仪社会,是其存在最大的历史意义。

**附记:** 本文是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核心聚落综合研究·长江流域商代都邑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22YFF090360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即二里头文化晚期和二里冈文化早期处于青铜时代的形成阶段,而二里冈文化晚期至殷墟文化第一期属于青铜时代发展阶段。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21~948页。

[2]陈佩芬:《商代殷墟早期以前青铜器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六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13~933页;常怀颖:《盘龙城铜器群与“二里岗风格”的确立》,《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

[3]张昌平:《从三棱锥形器足看中国青铜时代块范法铸造技术特质的形成》,《考古》2022年第3期。

[4]苏荣誉:《见微知著——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垫片及相关问题》,《国博讲堂(2013~20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5~166页。

## **Bronze Artifacts of the Erligang Cultur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ZHANG Changping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During the Erligang culture period, bronze artifacts were primarily containers and weapons. Some food and wine vessels were developed into ritual objects, later becoming a stable artifactual combination. In terms of production, the three-part outer mold became the basic form of the combined mold technique, and decoration became an important mode of expression for ritual objects, which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production techniques. Animal motifs such as animal face patterns became the primary decorative content, signaling the emergence of abstract art styles in ancient China. Therefore, the Erligang culture bronze artifacts had largely acquir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Bronze Age artifacts and began to shape the ceremonial aspects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 Erligang culture; bronze artifacts; manufacture; ritual vessels

(责任编辑、校对:段姝杉)